

香港理工大學

中國文化學系

MA 畢業論文

題目：從沈從文小說的人物死亡淺析其創作意識

指導老師：賈晉華

學生姓名：蘇聖涵

學號：17084821G

## 摘要

本文從沈從文小說的人物死亡入手，結合所處的時代背景、生活經歷和作品文本來分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右沈從文的創作意識。主要通過文本細讀、文獻研究的方法，分析《媚金·豹子·與那羊》、《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黃昏》、《石子船》和《邊城》這六部小說，從小說描寫的視角、抒情敘事語言與死亡、死亡的方式三個方面來分析其死亡背後的創作意識。本文第一章將這六部小說的敘事視角分為「有我」的旁觀視角、「無我」的全知視角、以及兩種視角的不斷轉換這三個論題。第二章是抒情敘事語言與死亡，從牧歌語言與死亡情節、日常抒情與死亡和人物內心獨白與死亡語言三個方面來分析作品。本文第三章將小說中人物死亡的方式，分為人為因素的死亡和自然因素的死亡，而這兩種方式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時代特徵下，不同的人性所面臨的死亡與環境、死亡與愛情權利、死亡與生存的矛盾的創作主旨，以及作者的創作意識中對生命偶然意外的無可奈何之感和宿命意識的表達。通過從小說視角、語言、死亡方式三個方面對文本進行層層深入地分析，本文較為深入地探討沈從文小說中反復出現的死亡主題，以及他是如何通過死亡來表達其深刻的創作意圖和小說主旨。

關鍵字：沈從文，死亡，創作意識

## ABSTRACT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death of the characters in Shen Congwen's short stories, and analyzes the creative consciousness of Shen Congwen around the 1930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his life experiences and works. This thesis mainly applies text study and literary analysis to read "Mei Jin Leopard and the Sheep", "Three Men and One Woman", "Seven Savage and the Last Spring Festival", "Dusk", "Stone Boat" and "Border Town". The six stories describe the consciousness reflected by the dea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ovel description, lyric narrative language and death themes.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thesis,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of these six stories are discuss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spectator perspective of "having me", the omniscience perspective of "no self", and the constant transformation of two perspectives. The second chapter studies the lyrical narrative language and death, from the pastoral language and death plot, daily sensation and death, and the character's inner monologue and death language. In the third chapter of this thesis, the way of death of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is divided into the death of human factors and the death of natural factors.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eflected by these two methods, people face death and environment, death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ove and rights, death and survival, as well as people's sense of helplessness and the expression of fatalism.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erspectives, language, and death methods,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theme of death in Shen Congwen's short stories and how he described death to express his profound writing intentions and the central ideas of the stories.

Keywords: Shen Congwen, death theme, writing consciousness

## 鳴謝

不知不覺間，畢業論文就這樣匆匆地結束了，好像也為這段碩士的時光畫上了句號。還記得，當初對文學的熱愛，對歷史的好奇，對中國文化的無限興趣，這些都讓我毅然決然地來香港讀書。一年半的時間讓我獲益匪淺，學識的收穫，智識的提升，非常感謝可以經歷這段難忘的時光。與文學相遇，與理工大學老師相識，與文化相守，這段時光都將深深地紀錄在心底。如今，還沒來得及去細細回想，碩士生涯就這樣恍惚間要結束了，思緒萬千。

碩士生涯的這段時光是甜蜜而憂傷的，每一次有獲取知識的喜悅，每一次也有創作的困惑不解；每一次有對自己作品的懷疑和難過，每一次也有老師解惑後的滿足和欣喜。在這一次次的挑戰和努力中，收穫的一切都讓我倍感珍惜。因此，在這裡我要感謝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賈晉華教授，在開始選擇論文範圍之時，賈晉華恩師幫助我不斷的修訂論文範圍和撰寫的方向，並在論文撰寫中不厭其煩地幫助我梳理論文的邏輯和結構，細緻認真地給予我指正和建議，同時，恩師一次次地幫助我在內容和語句上精益求精，賈晉華恩師的鼓勵信任讓我一次次克服難關完成論文，她專注嚴謹的學術態度，細緻認真的研究精神，豐富淵博的知識都讓我無法企及。非常感謝有賈老師的指導，感恩與賈老師學習的這段時光。潘律博士作為我的第二任導師，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也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雖然出差在外，但仍然不辭辛苦地幫助我審閱論文和給予意見。感謝吳宛怡老師，在選定論文題目之初，面對論文題目茫然的我，吳老師也給予我很多建議。感謝陳朗老師，有幸可以和老師修習佛教這門課，老師

淵博的知識和謙虛的態度，對待學術孜孜不倦的精神都讓我深深折服。感謝邢義田教授，啟發了我對畫像知識和歷史文化的興趣，感動於邢教授對知識不斷挑戰和探索的精神。也要感謝朱鴻林院長、韓孝榮主任、梅林寶老師、徐啟軒老師、胡光明老師、黃秀顏老師、史凱老師，感謝你們為我開啟了一道知識的大門，在此和你們說一聲「謝謝」。還要感謝我的同窗好友們，特別是樊姝廷同學，她是一名非常嚴於律己的女孩，每天嚴格的完成自己制定的計畫，並且在學習期間不曾懈怠和懶散，這種堅持不懈的精神非常值得學習。

最後，也要感謝我的父母，感謝他們在我學習生涯中的鼓勵和信任，給予我極大的信心和力量，讓我可以堅持自信地完成學業。

撰寫論文的過程是一段美好而充實的時光，在這段時光中我感受到老師們心無旁騖專著探究的學術精神，感受到父母同學的鼓勵。在這段時光中我更看到自己的進步和努力。感謝我的老師們，感謝我的父母，感謝我的同窗好友。

## 目錄

摘要

ABSTRACT

鳴謝

目錄

導言

一· 沈從文小說死亡的敘事方式

(一)「有我」的旁觀視角

(二)「無我」的全知視角

(三)視角轉換下的時空對應

二· 抒情語調與死亡

(一)牧歌語言與「死亡」情節

(二)日常抒情與死亡語言

(三)人物內心獨白與死亡語言

三· 沈從文小說中人物死亡的方式與創作意識

(一)人為因素的死亡

(二)自然因素的死亡

結論

參考文獻

## 導言

在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上，沈從文的文學地位可以說是跌宕起伏。1922年沈從文初到北京時，只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只有小學學歷的旁聽生。到三十年代，受到魯迅、徐志摩、周作人等一批重要作家的賞識，其作品獲得不小的呼聲。但之後受到左翼作家的攻擊，1948年立誓退出文壇。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再一次聲名鵲起，多位學者開始高度評價他為「京派小說的領先者」。<sup>1</sup>從他前半生創作小說，到後半生專注於考古工作，都賦予了很高的地位。學者們開始更加客觀全面地研究和評價沈從文，不再將他簡單地定位為鄉土作家、京派作家、反革命作家等。但多數學者基本上都關注《邊城》等代表作品，對其他作品的研究和解讀還有所欠缺，因此還不能夠準確清楚的認識和定位沈從文，如嚴家炎、凌宇等都稱沈從文是一個「謎」。<sup>2</sup>

要想客觀準確地評價沈從文，就需要先清楚地理解他的作品和創作意識。劉洪濤指出，「沈從文小說的思想藝術資源十分龐雜、多樣。從思想上看，有中國道家、儒家、佛家影響的痕跡，西方哲學家、思想家如盧梭、尼采、叔本華、伯格森在沈從文作品中也能找到他們的回聲。從藝術上看，沈從文推崇楚辭、《史記》、魏晉文學、佛經故事，對《聖經》、莫泊桑、屠格涅夫、契可夫、都德、喬伊絲、勞倫斯同樣傾心」。<sup>3</sup>所以沈從文的創作意識受到多方思想的影

---

<sup>1</sup>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77。

<sup>2</sup> 劉洪濤，《沈從文小說於現代主義》（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頁6。

<sup>3</sup> 劉洪濤，《沈從文小說於現代主義》，頁17。



響，他自己也說，「看的多而雜，就不大可能受到什麼影響，也可以說受總的影響。」<sup>4</sup>

沈從文可以說是中國短篇小說之王，在二十餘年的創作生涯中共創作了二百餘篇小說，這個數量可以算是「高產作家」。本文選擇沈從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短篇小說，包括《媚金·豹子·與那羊》、《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黃昏》、《石子船》和《邊城》，來分析作者是如何通過作品中人物的死亡來表達他的思想。1928年是沈從文創作的分界線，小說《柏子》是他創作走向成熟的標誌。<sup>5</sup>而這6篇小說主要是沈從文在1928年-1993年之間創作完成的，既可以充分體現出沈從文成熟的創作意識，又可以表現出這段時間內作者人生經歷的變化所帶來的思想觀念的改變。

「死亡」，也就是生命的最終歸宿，這在沈從文的小說中是不陌生的，因為他的小說中有各種各樣人物的死亡。例如，在其代表作《邊城》中，一共講述了三次死亡事件和四個人的死亡，分別是翠翠父母的殉情，天保的溺水而亡，爺爺的離世。其中雖然以翠翠愛情的悲劇為主要線索，但一切情節和人物情感的推動都以小說中人物的死亡為重要結點。在本文所選的六篇作品中，人物的死亡也是重要的情節和主題。

如何面對「死亡」這個終極的關懷，是從古至今一直困擾人們的話題。

「生」與「死」相互關聯，有「生」必有「死」，中國人的「生死觀」往往融合了儒、道、佛的傳統文化和宗教元素。儒家認為，「不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所以關於「死」儒家的態度是雙重的。其一是認為要理解死亡就要先

---

<sup>4</sup> 沈從文，〈答凌宇問〉，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西安：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卷十六。

<sup>5</sup> 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長沙：岳麓書社，2006），頁180。

理解「生」，也就是生的意義，如何對待生。所以就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入世的人生觀，孟子更有「捨身取義」的死亡觀，這就將死亡與道德、與責任相聯繫，為死亡增添了不朽的意義，具有了永恆的價值。其次，儒家思想更多的是關注生的價值和意義，甚至將死亡也標記了死亡的「道德」價值，對待死亡本身刻意迴避，對死與生之間的關係未作深入探討，雖然從《禮記》等書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對死亡的外在儀式形式十分重視，比如喪葬禮儀中不同階層的人服飾禮儀的不同，但這只能說明「事死如生」，活著的人對待身邊人死亡的態度。道家既追求生而自由自在，同時也提出修煉長生不老、得道修仙的目標；道教對待死亡是希望另外一個享受生活的地方，希望將現有的榮華富貴帶到未來的世界繼續。佛教讓人們領悟「生」就是「苦」，人生的過程也是苦，並且需要六道輪迴，生死之間是循環的，人們的目標不是生死，而是為了超脫六道，可以擺脫輪迴之苦，進入涅槃的境界。儒、佛、道三家對於生死觀有不同的關注和認識，並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得到互相補充與融合，

雖然中國人的生死觀往往融合儒佛道的思想，但儒家「入世」和宗法制度的影響最為傳統而深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態度背後的責任意識與「生死觀」相聯繫，導致人們對待「死亡」的態度非常謹慎，甚至可以說是逃避，「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傳統信仰就是這樣延續下來。當這種責任意識不斷加強，人們把「死亡」與「社會意義」「責任價值」聯繫起來，將死亡賦予崇高的評價和地位，如「捨身取義」的價值觀。明清戲劇中為了愛情殉情的男女是不被提倡的，只有「貞節烈婦」的事蹟才是值得宣傳的。但這種生死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出現了重大變化，這主要是因為「人」的解放，提倡人性和自我意識的覺醒。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分界點，之前是中國傳統的生死觀，之後是「人」的自我意識和生命的關注。

袁進在《中國文學觀念之近代變革》一書中指出，五四運動提出的「新文學」是相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文學為基礎的「舊文學」提出的，從舊文學到新文學也就是從「道」到「文」的觀念變化。在中國傳統中，「道」就是「政教」的意思，所以舊文學就是為了政治服務的。而新文學的「文」則是對人的生命體驗的表現和關注。<sup>6</sup>這種文學觀念的改變，開始了對人的關注，也就有了對生死問題的不同看法和關注。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個充斥著戰爭、政權更迭的社會，人們隨時面臨死亡的威脅，因此文學作品中關於死亡的多樣表達，充分表現了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對生死看法的不同。最早關注描寫死亡的是魯迅，他的《狂人日記》《藥》等多部作品都主要表達對傳統文化「吃人」本質的批判，對看客們的冷漠旁觀態度的諷刺，學者多從這個方面研究魯迅的死亡觀。

同一時期的沈從文雖然在眾多短篇小說中涉及了死亡的主題，但以往研究沈從文的學者主要關注他所表現的巫楚文化以及所創造的湘西世界。如凌宇撰寫的國內第一部研究沈從文的學術專著從沈從文的人生歷程以及他的人生觀和對美的藝術觀，來分析他作品中所反映的詩性特點和他的文學態度品格。<sup>7</sup>龍慧萍分析了沈從文小說中神巫所帶有的非理性因素。<sup>8</sup>趙園認為沈從文通過構築的湘西世界來發現性愛情慾中的健全人性，以及未被城市污染的文化，沒有階級法律倫理，從五四的批判之中出來，顯現了經過改造的民族性格的精神。<sup>9</sup>趙學勇主要從西方的哲學、社會環境看沈從文。<sup>10</sup>劉洪濤通過非理性與原始性、民族想像與國家認同、時間形式、故事型態、敘事手法幾個方面來表達沈從文作品

---

<sup>6</sup> 袁進，《中國文學觀念之近代變革》（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頁6。

<sup>7</sup> 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長沙：岳麓書社，2006）。

<sup>8</sup> 龍慧萍，〈沈從文湘西世界中的神巫形象〉，《文藝爭鳴》，卷7（2007年），頁144-146。

<sup>9</sup> 趙園，〈沈從文構築的“湘西世界”〉，《文學評論》，卷6（1986年），頁50-66。

<sup>10</sup> 趙學勇，《沈從文與東西方文化》（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

中存在的現實主義是五四文化運動的成果。<sup>11</sup>杜素娟結合沈從文的經歷，分析沈從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五四文化革命的再思考。<sup>12</sup>周仁政主要講述巫楚文化的神、自然、人對沈從文作品的影響，將作為原始拜物教的巫楚文化與沈從文創作理念和文化理念影響，共同反映了人與自然的和諧，讚揚了人的自然生命形式及其情感本質方面的深刻意義。<sup>13</sup>吳世勇主要從鄉土、都市、出版、女性、政治六個因素來解析沈從文的創作。<sup>14</sup>黃琦旺主要從鄉下人的性情及反復書寫的情慾來表現出他個人抒情的敘事文體，以及對近世小說的抒情性敘事的認知。<sup>15</sup>唐東堰主要以「生命」「抽象」「神」三個維度來分析沈從文，認為其通過追求美而重造人性、人心以改造世界。<sup>16</sup>吳正鋒主要從沈從文的跨文體、人物創作、敘事藝術以及詳細的烏托邦理想化構建來研究。<sup>17</sup>杜素娟認為，沈從文很好地吸收和傳承了中國傳統精神以及時代精神，形成了他獨具個人特色的創作理念，從沈從文的精神構成、文化思想、思維方式、小說敘事、語言風格以及創作軌跡等方面進行研究。<sup>18</sup>美國學者金介甫指出沈從文創作中的社會背景和地區背景，以及他與五四時期其他學者之間的關係，體現他的鄉村生活經歷和士兵生活經歷以及他的社會立場，同時還有他個人的社會道德觀，尚武精神的地方特色和苗族文化，將一個真實的湘西世界展現在讀者眼前，並且還紀錄了最後

---

<sup>11</sup> 劉洪濤，《沈從文小說與現代主義》。

<sup>12</sup> 周仁政，《巫覡人文—沈從文與巫楚文化》（長沙：岳麓書社，2005）。

<sup>13</sup> 吳世勇，〈論影響沈從文創作的六個因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

<sup>14</sup> 杜素娟，《孤獨的詩性—論沈從文與中國傳統文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sup>15</sup> 黃琦旺，〈沈從文小說的鄉下人意識和原始情慾與近世白話小說的型態〉（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

<sup>16</sup> 唐東堰〈生命的迷狂與神秘智慧—沈從文40年代創作與思想的另一面〉（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

<sup>17</sup> 吳正鋒，〈沈從文創作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sup>18</sup> 杜素娟，《孤獨的詩性—論沈從文與中國傳統文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湘西社會的發展和結局。<sup>19</sup>

可以說，學者們從不同角度來研究沈從文作品的深刻思想內涵和意義，但對他作品中死亡主題的關注卻不多。王德威注意到沈從文通過對砍頭題材的描繪，詩歌抒情的語言與死亡相結合而達到的反諷、詭異的氛圍，來表達對病態社會的批判。<sup>20</sup>解志熙解釋了沈從文從魯迅、周作人等一批知識分子學習到的抒情寫作和創作理念，以及如何從二、三十年代的自敘傳轉型，表達了他創作中想要表達的貧困簡陋的人性。<sup>21</sup>張光芒關注到沈從文對生死的坦然態度，表達了「生死有命的悲劇心裡」，並且他對死亡的宿命意識的必然、循環等特點。<sup>22</sup>尚百容認為，沈從文很多作品中都在思考死亡，但他就是「自然面對」的從容態度。<sup>23</sup>張華主要從現代死亡意識出發，表達沈從文認為人的死亡是本性，生命悲劇和善待生命的意識。<sup>24</sup>羅錦鴻認為沈從文的死亡書寫是對當時文學書寫的一種糾偏，體現了他的哲學思考和審美意義。<sup>25</sup>胡斌分析了沈從文在情愛小說中，表達了「愛與死為鄰」的審美藝術價值以及背後的原因。

「死亡」是沈從文小說中不斷出現的背景，也是作者希望努力可以建造的

---

<sup>19</sup> 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sup>20</sup> 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矛盾，老舍，沈從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sup>21</sup> 解志熙，〈愛慾書寫的「詩與真」沈從文現代時期的文學行為敘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期 11 (2012 年)，頁 82-111。

<sup>22</sup> 張光芒、張立傑，〈論沈從文小說的宿命意識〉，《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期 4 (2000 年)，頁 23-26。

<sup>23</sup> 尚百容，《直面與超越—20 世紀中國文學死亡主題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6)。

<sup>24</sup> 張華，〈論沈從文的死亡意識〉，《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20 (2003 年)，頁 85-89。

<sup>25</sup> 羅錦鴻，〈論沈從文小說中“死亡書寫”的意義〉，《文學界：下旬》，期 11 (2010 年)，頁 63-64。

帶有真實感的世界。1902年出生的沈從文，九歲的時候第一次明白「死亡」代表的含義。那也是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沈從文近距離的接觸什麼是「死亡」、「人生」。當時革命發展到他的家鄉鳳凰，當地鄉民開始反朝廷起義，他的父親也參與其中，結果起義失敗了。之後，官兵大規模鎮壓，基本上以鄉民每日一百的數量進行屠殺。「我剛好知道『人生』時，我知道的原來就是這事情。」<sup>26</sup>沈從文的認知中，「人生」不再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人生」是源於「死亡」，因為「死亡」所帶來的血腥和殘酷才開始認識「人生」，而「死亡」相對應的「生」也就更加難能可貴，有「死亡」才是當時的社會，有「死亡」才是一個真實的社會。

王德威認為，「沈從文則在斷頭場景中看到人類種種動機的複雜性和共存性」。<sup>27</sup>沈從文在散文中也講過，「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做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sup>28</sup>王德威說的「人類種種動機」其實也就是沈從文筆下的「人性」、「人生的形式」，「希臘小廟」也就是「湘西世界」，雖然眾多學者都稱那個風景優美、民風純樸的「湘西世界」是一個烏托邦的社會，但不可否認的是那裏依舊有死亡，有不同階層的人，有生存下痛苦掙扎的人們，這是一個沈從文不懈努力去創造的「湘西世界」，相比於都市中冰冷的法律制度，這個世界展現了很多「溫暖」，但這個世界也不是存在於童話世界裡，它是真實的，所以這裡會有無法掌握的命運，會有陰差陽錯的誤會，會有

---

<sup>26</sup> 沈從文，《從文自傳》（香港：匯通書店，1976），頁31。

<sup>27</sup> 王德威，〈“頭”的故事：歷史·身體·創傷敘事〉，《東吳學術》，期1（2012年），頁105-121。

<sup>28</sup> 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收入沈從文編，《沈從文選集》（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卷九，頁5。

陰鬱和死亡。正如《邊城》從前半部分的美好到後半部的陰鬱氣氛，再到最後結局的人物死亡離開，都是為了更好的展現出這個世界的真實性，因為死亡的存在更充分地表達了人性。所以死亡的背景下這種自然的「人生形式」是對社會殘酷、政治更迭的反映，人們為了擺脫命運和現實所做的真實選擇。當然這種選擇不一定是美好的或者無私的，但這種選擇一定是對動盪社會下的真實內心的表達。

本文主要通過來解析沈從文如何使用「死亡」作為小說的背景來表達「人性」。這六部小說的人物主要有自殺、砍頭、溺水、病死這4種死亡的方式，基本上囊括了所有沈從文小說中描述的死亡，並且故事發生的地點各有不同，《媚金·豹子·與那羊》、《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邊城》主要是發生在純樸簡單的村莊裡，是沒有官兵進駐的社會，而《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黃昏》、《石子船》是發生在經濟社會略為發達的市鎮裡。本文採用文本細讀、跨學科研究法、文獻研究法，結合沈從文的相關歷史資料進行研究，同時還需要借助社會學的方法和手段來分析死亡所反映的不同社會情況和時代價值觀，因此本文從死亡的主題、敘事、語言等方面進行分析，全面考察死亡主題所具有的重要的創作意識和社會環境。

全文由三章構成，首章討論沈從文小說死亡的敘事方式，通過敘事視角的不同來解讀死亡背後的作者情感和意圖，包括三個不同的視角，「有我」的旁觀視角、「無我」全知視角、以及兩種視角不斷轉變下的時空對應。第二章分析沈從文小說的死亡與語言，包括牧歌語言與死亡情節、日常抒情與死亡語言和人物內心獨白與死亡語言三方面。第三章研究沈從文小說人物死亡方式與創作意識，主要通過死亡方式的不同進行分類，分為人為因素的死亡和自然因素的死亡。人為因素的死亡背後折射了死亡與環境、死亡與愛情權利、死亡與生存的

矛盾這三個現實問題，自然因素的死亡則凸顯了命運的意外和偶然性。



## 一· 沈從文小說死亡的敘事方式

沈從文的死亡小說主要從「有我」的旁觀視角、「無我」的全知視角、以及兩種視角的不斷切換的情況下表達他的創作意圖。這三種不同的敘事視角讓讀者對小說中的死亡有不一樣的閱讀感受，對主題也有不同的解讀。「有我」的旁觀視角讓小說帶有一定的主觀因素，因此也導致對全部的內容和情節不夠清楚明白，這種「有我」的疑問雖然給閱讀帶來障礙，但另外一個方面也讓主題表現當時不同階層的人的生活狀況。「無我」的全知視角使小說情節和邏輯非常清楚完整，既有完整的背景交代，又有完整的結局，這也讓「死亡」在小說中是順理成章的，不會讓讀者有一種匪夷所思的感覺。而在「有我」旁觀視角和「無我」全知視角的雙重切換下，作者讓小說具有時空穿越的感受，將當時和現在進行時時的對比，表現了不同時代下，人們的不同觀念的變化，帶有了歷史元素的解讀。但不管是以上三種中的哪個視角，都讓讀者清楚看到作者運用不同視角來解讀死亡背後的意義，反映了社會的不同層面，不同階層的人性。

### (一)「有我」的旁觀視角

在沈從文「有我」的旁觀視角死亡小說裡，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小說《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sup>29</sup>這篇小說創作於1930年8月，是收藏在《遊目集》中的四

---

<sup>29</sup> 吳正鋒，〈沈從文創作研究〉，頁225。

篇小說中的一篇。作者成功地將這個獨特的旁觀視角和人物的死亡聯繫在一起，在表達上重要情節部份都採用「輕描淡寫」的簡單敘述，這讓閱讀具有意猶未盡的感覺，使得小說在內容和主題上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值得後代學習和借鑑。

小說採用獨特的「有我」的旁觀視角來講述一個商會會長十五歲的女兒吞金而死的故事。作者「我」和部隊裡的同鄉「號兵」，還有豆腐鋪的年輕老闆都喜歡這個女孩。在女孩吞金死後，「我」和「號兵」猜測消失的豆腐鋪老闆將屍體背到山洞裡抱著，因為有傳說這樣方式可以使人復活。最後的結果是「我」聽到盜走少女的屍骸在山洞中被發現。這個「神奇」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作為小說中的旁觀者的生活沒有任何影響，號兵還依然是號兵，沒有離開軍隊，而「我」依然不知道前路在哪裡。這種小說中「有我」的旁觀視角自然將小說中「我」的心理和身邊的遭遇交代得非常清楚，比如小說開始部份「我」所在軍隊各處尋找駐宿的地方，「我」知道的「號兵」是如何瘸腿以及他康復的整個過程。但對小說中其他人的情況和現狀就交代得不太清楚，比如對於豆腐鋪老闆的個性背景、會長女兒的情況描寫都始終是一種朦朧模糊的狀況，而這種模糊的感覺在最後凸顯人物死亡的部份更是達到了高潮。在小說最後，「我」很奇怪，「為什麼吞金，同些什麼人有關係，我們當時一點也不明白，直到如今也仍然無法明白。（許多人是這樣死去，活著的人毫不覺得奇怪）。」<sup>30</sup>人物死亡是推動情節的一個重要部份，甚至是小說基調的轉折點，而旁觀的「我」卻無法知道全部內容。死亡在沈從文的筆下帶給讀者一種「懷疑」的態度，同時讓「我」代替「讀者」問出了死亡的「原因」，但敘事視角的限制讓讀者無法得到

---

<sup>30</sup>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六，頁41。

準確的死亡原因，這給讀者心中留下了永遠不能釋懷的疑問。死亡在「有我」的旁觀視角限制下帶給讀者一個不能解釋的問題，這也將小說的懸疑色彩達到高峰，因此後面會說：「這個消息加上人類無知的枝節，便離去了猥褻轉成神奇。」<sup>31</sup>這種「有我」的旁觀視角的設置讓死亡蒙上了一層神秘模糊的面紗，這必然也導致了主題的模糊性，也就有了不同學者對沈從文創作意圖的不同揣測。小說中的愛情因素、砍頭場景、帥氣軍官、豆腐店老闆，既有女子身邊出現不同階層背景的人，還有作者一貫對背景的描寫鋪設，愛與死，浪漫與恐怖的對立都增加了主題解讀的困難，讓讀者在軍隊砍頭的不安氛圍下有一種詭異的迷茫感。

相比其他視角的作品，沈從文在「有我」旁觀視角的小說中很少有整體環境的描寫和意境的鋪設，更多的筆墨著重於人物心理描寫方面。這緣於作品中「我」的設置，而且加上題材的特殊性，使得讀者閱讀起來有一種懸疑探案的感覺，讓讀者跟著「我」的視角去感受人物、了解現實、揭示黑暗，看到不曾發覺的現實和殘酷。所以小說從開始部分講到，「或者這事情團部的軍需能夠知道，因為沒有落雨時候，開差的草鞋用的很少。」<sup>32</sup>然後讀者在「我」的帶領下發現不同等級的軍官穿著不同品質的鞋。小說中人物的點滴發現，都帶給讀者一種「原來如此」打開謎底揭密的感覺。尋找駐扎地的「我們」又累又餓，「像一隊無家可歸的遊民」，吹了幾次號角的號兵也因為意外摔殘疾了，「我」和殘疾的「號兵」都喜歡那個女子，「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這句話恰像為我們說的。」<sup>33</sup>小說情節的不斷發展，從人物內心的喜歡到心底的自卑矛盾，這種種心

---

<sup>31</sup>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卷六，頁 48。

<sup>32</sup>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卷六，頁 25。

<sup>33</sup>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卷六，頁 32。

裡終於在看到年輕營長去女子家裡而爆發，終於「我」和「號兵」打了一架。在「我」視角的描繪下，我們看到了人物細膩的內心世界和現實人物的身分地位懸殊的冷酷現實。而後在女子死亡以後，「其實這樣女人活在世界上同死去，對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呢？」<sup>34</sup>「我」的視角將人物內心理智與情感的不斷糾葛矛盾，甚至還有「我」懷疑「號兵」偷走屍體，多次的質疑詢問，這種人物之間的懷疑爭執都是真實而深刻的。在這樣的背景鋪設下就讓讀者有了無法理解的疑問，女子死亡的不了了之和奸屍傳說的情節。這樣的前後對比，情節人物的真實存在但卻背離現實社會和邏輯思考能力的死亡和奸屍，讓讀者發出這樣的感慨：這就是現實的社會麼？這矛盾而詭異的故事就是作者想要表達的主題和揭露的現實，越矛盾就越容易讓讀者對小說發出質疑和思考，也就讓小說具有的獨特的藝術審美價值。因此當我們回看小說開始，「凡美麗的都常常不是真實的，天上的虹同睡眠的夢，便為我們做例」。<sup>35</sup>小說「有我」的旁觀視角就是將顯得不夠真實的情節和故事可以讓讀者去相信其真實性，從而可以讓我們去思考這背後的原因和其中的主題。

## （二）「無我」的全知視角

沈從文全知視角的死亡小說裡，《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是1929年3月在上海完成的，收藏在小說集《旅店及其他》的四篇小說中的一篇。這是一個帶有政治寓言性質的短篇小說，講述了政府官兵到來之前，北溪村的師徒7個人為了逃稅而躲進山洞裡，後被官兵發現砍頭的故事。

---

<sup>34</sup>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卷六，頁42。

<sup>35</sup>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卷六，頁25。

小說採用了「無我」的全知視角，這種敘述將小說人物和情節的前因後果都會介紹得清楚明白。小說開始就介紹了北溪村的周邊背景，讓讀者對革命和官兵有了一定的認識，也了解了其他村莊在官兵進駐以後的樣子。因此讀者也會理解七個人為什麼試圖阻止官兵進入村莊，雖然計劃失敗搬去山洞中生活。而在官兵頒布法律禁令徵稅以後，村民為了逃避禁令來到山洞中喝酒，事情敗露，七個人被砍頭。小說的整個情節發展都描述得清楚簡單，不會有讀者模糊和疑惑的地方。從逃去山洞之前到在山洞中生活，最後村民的舉動，這都讓小說的主題表達得非常明確，揭示當時黑暗的社會現狀，內戰下民不聊生的現實，鄉村的黑暗統治。因此小說最後寫道：「這故事北溪人不久就忘了，因為地方進步了。」<sup>36</sup>讀起來不無諷刺的話語將主題很明確地用一種全知的視角告訴了讀者。這種全知視角，可以說是一種上帝俯瞰的角度，從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到不同人物的行動心理，都直接全面地告訴讀者，讓讀者有一種全知全能的感覺。

同樣，沈從文 1928 年創作的小說《石子船》也是如此。《石子船》是小說集《石子船》七篇中的一篇。小說講述了康村的村民靠運石子為生，主要人物分別是亂世下的中年船主、侄子八牛以及賭博散伙。首先作者簡要地講述康村的「發展史」，因為採石運石而漸漸成為小小的市鎮，而主人公中年船主和他的散弟兄靠此為生，其中散弟兄可以分為兩類人，八牛和喜保等人。之所以將散伙分為兩類人，是因為他們分別展現了不同的人性和形象。作者用一種全能的視角描述這不同的三種人，天天擔心兩罈銀錢的船主，單純年輕的八牛，賭博尋樂的喜保等人。作者客觀地描述了人物對話的過程，有八牛和船主的吵

---

<sup>36</sup> 沈從文，〈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八，頁 326。

架，以及喜保和船主的對話。並且還將船主時時懷疑革命會把錢拿走，到終不放心去姑母家檢查一下錢，這種心理狀態的描繪一步步升級，這些都用了一種全知視角體現的淋漓盡致。而八牛青春簡單的心思也在他的行動中給讀者深刻的感受，爬樹泅水，理直氣壯的借錢，簡單坦率地將錢借給別人，全方位地展現給讀者一個朝氣不諳世事的小孩子，而這樣擅長泅水的八牛卻因為手夾在石縫中而溺水死亡，從前面鮮活的生命到最後破布裹身的屍體進行戲劇對比。而喜保等人為了賭博向船主借錢甚至爭吵，表現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樂生活觀念，但在死亡面前卻是靜默不語的沉寂。「死亡」背後不同人物的生存境遇都清楚地表達出來，不同階級、不同背景、不同年齡的人在動亂社會中不同的擔憂和處境也都一一刻畫出來。

綜觀小說《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和《石子船》，我們會發現作者在運用全知視角創作小說的時候，都非常刻意清楚地描述事件發生的地點和整個背景現狀，北溪村的現實景況和村民們的心裡，康村的發展歷程和城市官兵情況，而這樣簡單清楚的背景鋪設可以說是「無我」全知視角的獨特之處。這種背景的交代不僅僅讓小說整體的邏輯情節流暢合理，不會給讀者帶來「視覺盲區」，產生一定的障礙，而且在表達主題上都十分清楚明白，不會有「欲言又止」的感覺。

### （三）視角轉換下的時空對應

沈從文不僅擅長從「有我」的旁觀視角和「無我」的全知視角來構建小說，還擅長從兩種視角的不斷轉換來表現時代的變化，人們觀念的變化，人性不同的表現形式。

小說《媚金·豹子·與那羊》是創作於 1928 年冬，收藏在小說集《龍朱》中五篇小說中的一篇。小說主要講述了白臉苗中最美的女人媚金，及鳳凰族中相貌極美且有一切美德的男子豹子，兩個人通過唱歌而相愛的故事。作者在小說開始部份用了不小的篇幅去解釋故事有不同的版本，然後告訴讀者這篇小說版本的來源。「我的故事的來源是來自大盜吳柔。吳柔是……」<sup>37</sup>將「有我」的視角帶入到小說的敘述當中。而在小說後半部份就採取了「無我」的視角，詳細地描寫了兩人約定夜晚在洞中相會後，豹子為了可以尋找到一隻通體雪白的山羊，表達自己對愛情的忠誠和戀愛的堅固，因此錯過了約定的時間。而此時誤會豹子故意失約欺騙自己的媚金將刀子插進自己的胸膛，豹子隨後趕到，也自殺在洞中了。這種從「有我」視角到「無我」視角的變化不僅增加了小說的真實性，讓讀者對故事內容不會有懷疑的感覺，同時還在這種變化中，讓讀者看到了二十世紀和原始社會的變化和觀念的改變，並在小說中不斷出現今昔的對比，對愛情、美貌的不同時代理解，這也表達了作者的創作意圖。如小說中將兩人幽會的地方「寶石洞」進行了今昔的對比。「寶石洞當年，並不與今天兩樣」，「地方的好習慣是消滅了，民族的熱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中國女人，把愛情移牛羊金銀名虛事上來了，愛情的地位顯然是已經墮落，美的歌聲與美的身體同樣被其他物質戰勝成為無用東西了。」<sup>38</sup>作者通過寶石洞時代的改變，將當今社會的價值觀放在了原始代表貞節愛情的地方，兩種價值觀的強烈反差不僅僅是說今昔對比下時代的變化，更是人們觀念的變化，這也是作者想讓讀者反思的主題。「愛情的字眼，是已經早被無數骯髒的虛偽的情慾所玷污，

---

<sup>37</sup> 沈從文，〈媚金·豹子·與那羊〉，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二，頁 393。

<sup>38</sup> 沈從文，〈媚金·豹子·與那羊〉，卷二，頁 396。

再不能還到另一時代的純潔了。」<sup>39</sup>這種坦白直率的拷問讓讀者反思，時代的改變到底讓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呢？人們觀念的變化到底應該如何對待呢？這種視角的不斷切換，今昔的對比，時空的對照，更讓讀者開始感受到作者內心的矛盾和困惑，也讓小說的主題不僅僅停留在簡單的愛情故事層面，更具有宏觀社會層面下時代價值觀變化的探究和反思。

同樣，這種視角轉換還出現在小說的後面情節。「這女人，全身發育到成圓形，各處的線全是弧線，整個身材卻又及其苗條相襯。有小小的嘴與圓圓的臉，有一個長長的鼻子。有一個尖尖的下巴。還有一對長長的眉毛。樣子似乎是這人的母親，照到何仙姑捏塑成就的，人間絕不應當有這樣完全的精緻模型。」<sup>40</sup>可以看出這是作者採用全知視角下的描繪，這種描繪具有客觀陳述的清晰效果，讓讀者對媚金的美貌有了直觀的畫面感覺，而且語言客觀直白，不帶有個人的主觀判斷成份。之後，作者就採用「有我」的旁觀視角，將現代社會的觀念與古代觀念進行對比，語言上也帶有個人的主觀觀念和評價的特點。「生長於二十世紀，一九二八年，在中國上海地方，善於在朋友中刺探消息，各處造謠，天生一張好嘴，得人憐愛的文學家，聰明伶俐為世所驚服，但請他來想想媚金是如何美麗的一個女人，仍然是很難的一件事。」<sup>41</sup>這就將媚金的美貌放置在現代人的評價之中，告訴讀者以現代人的眼光依然難以描述媚金的美貌。可以說，作者非常創意地將愛情、美貌放置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並且採用客觀敘述和主觀評價的切換，讓小說中處處出現不同時代的對比，空間的對比，這也就是「有我」視角和「無我」視角的不斷轉換，「有我」視角所在的時代去

---

<sup>39</sup> 沈從文，〈媚金·豹子與那羊〉，卷二，頁 397。

<sup>40</sup> 沈從文，〈媚金·豹子與那羊〉，卷二，頁 396。

<sup>41</sup> 沈從文，〈媚金·豹子與那羊〉，卷二，頁 397。



審視「無我」視角的時代，這種轉換既沒有讓讀者陷入小說中夢幻般的愛情，避免讓讀者懷疑故事的真實性，又讓讀者真實地感受到最後人物選擇「死亡」所帶來的感動。同時，在表達主題方面還具有高度的反思和研究價值。

## 二 · 沈從文小說的抒情語調與死亡

在沈從文描繪死亡的小說中，採用了「有我」的旁觀視角，「無我」的全知視角，以及兩種視角的不斷轉換展現時空對比，這些其實都是帶有一種冷靜、客觀、平實的方式去描繪現實，儘管「有我」旁觀視角中不可避免的有作者的心理描寫，但卻不會加入過多的個人批判和議論的元素，並且在情節語言的設置上使小說具有一種閱讀後「無悲無喜」的平靜，特別是在每個鮮活、青春、善良的生命結束以後，讓讀者感受到的不是「愛憎恨」，而是那種浸透生命的「孤獨」和「疏離」。這種客觀化敘事，他在〈《阿黑小史》序〉中講到，「便是我初步試用客觀敘述方法寫成而覺得合乎自己希望的。」<sup>42</sup>在湖南長大的沈從文，深受抒情化的古典文學傳統和五四文學西方文化的影響，在創作中努力地實踐客觀化敘事。正如劉洪濤認為，「在客觀化敘事從西方傳入中國以後，沈從文開始在創作中努力實踐。」<sup>43</sup>同時，沈從文還延續了古代傳統詩歌的特點，使得小說具有散文化結構、詩歌化語言。所以，王德威先生說，「沈從文終其一生致力於以詩歌來為小說遣詞造境。」<sup>44</sup>但客觀化敘事會讓小說的情節不具有「故事性」和跌宕起伏的效果，而抒情化的影響會淡化小說情節，使得小說情節並不複雜甚至相對簡單。因此當沈從文的作品中同時具有客觀化敘事和抒情化的結構，這就需要細心構思和努力平衡敘事的客觀化、結構的抒情化與小說情節

---

<sup>42</sup> 沈從文，〈《阿黑小史》序〉，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五，頁192。

<sup>43</sup> 劉洪濤，《沈從文小說與現代主義》，頁218。

<sup>44</sup> 王德威著，《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矛盾，老舍，沈從文》，頁229。

之間衝突矛盾的問題。如何解決這個衝突，在小說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作者的處理方式：抒情語調的背景鋪設和死亡的設置描繪。因此本章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說明，包括牧歌語言與死亡情節，日常抒情與死亡語言，以及人物內心獨白與死亡語言。

### （一）牧歌語言與「死亡」情節

沈從文堅持用抒情化的語調為小說鋪設背景，構建小說的整體氛圍。正如王德威所說：「借書寫小說而達到是詩歌抒情境界，正體現了沈從文文學創作的最高目的」。<sup>45</sup>這種抒情化的語言，既與中國幾千年來詩歌傳統的影響有關，又與西方牧歌情調傳入中國有關。「牧歌是一個取自西方的文學術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調』、『氣息』等一類詞彙搭配，對那些迴避現實矛盾，抒情氣息濃郁的鄉土文學作品作印象性的描述。」<sup>46</sup>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被譽為「鄉土作家」的沈從文多數作品都被認為帶有濃郁的牧歌情調。而為了讓情節簡單的小說中具有強烈的「故事性」，並且可以兼具客觀平實的敘述和牧歌化的語言，作者故意在小說結尾對「死亡」情節加以設置和運用。一方面，「死亡」是小說情節的重要組成部分，會極大的促進情節的發展。另一方面，在某種程度，它還會讓情節具有「轉折」作用，凸顯了小說結局的反轉效果和戲劇色彩。這兩方面都會讓小說具有非常強烈的「故事性」效果。所以當我們將死亡與牧歌化的語言放在同一空間，我們可以發現擅長「抒情詩歌語言」的沈從文，將美好和殘酷放置一處，殘忍地讓生命在優美的語言中結束，將生與死放

---

<sup>45</sup> 王德威著，《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矛盾，老舍，沈從文》，頁 225。

<sup>46</sup> 劉洪濤，《沈從文小說於現代主義》，頁 125。

置一處，這樣的強烈對比和反差也讓讀者反思小說中人物所處的社會背景和小說的主題。

在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中，牧歌抒情語言和死亡情節的突轉作用表現得非常明顯。作者通過抒情化的語言構建了一個憑水依山叫「茶峒」的如世外桃源般的美好山城，有優美的自然風光，有淳樸的渡船人爺爺和搭客，天真可愛的翠翠，善良陽光的天保傩送，甚至連妓女都是情深意重的人。這種抒情化的環境描寫在小說的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的開始部份，全面而清晰地將小小邊城茶峒的周邊環境展現給讀者。第一節簡單點出它的名字以及所處的有山有水的環境，第二節進一步描繪它周邊的環境，詩歌般的描繪河水和兩岸人家，「深潭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紋的瑪瑙石子」，「水中游魚來去，全如浮在空氣中」，「黃泥的牆，烏黑的瓦」，<sup>47</sup>一系列的場景描繪的靜謐優美，詩歌般的環境表現得淋漓盡致。在這樣美好的抒情語調之中，人物的一個個死亡讓小說從前面的美好轉變到最後悲痛的結局。翠翠父親服毒——翠翠母親自盡——翠翠傩送相愛——天保淹死——傩送離開——爺爺病死，整部小說在四個人物的死亡串連下走向結束。這四個人物的死亡都在不同程度的一層一層推動情節的發展，使得小說從歡快的開始走向傷悲的結尾。

小說共有二十一節，這四個人物的死亡主要出現在第一節、第十六節、第二十節。在小說第一節介紹人物的時候講到翠翠的媽媽，這是小說第一次講人物死亡，父親服毒，母親生下翠翠後就「吃冷水自盡」。然而小說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對死亡的描繪非常克制，在通篇的抒情敘事中隱約夾雜了「死亡」的字眼。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通過端午節、中秋節描繪了兩年的時間跨度，爺

---

<sup>47</sup> 沈從文，〈邊城〉，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六，頁79。

孫的日常渡船中，還曬太陽講故事，爺爺吹竹管翠翠唱歌，在渡船必經之路上，看到的花轎、牛群。在這成長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作者筆下爺爺和孫女的美好時光，還有傩送逗趣翠翠的「水裡大魚咬了手」，爺爺取笑翠翠做媒嫁人。但小說第四節卻出現了一個意外，可以看出作者抒情語言的背後隱約預設「死亡」的氛圍。爺爺與老友喝酒醉倒導致晚歸，翠翠在著急等待爺爺回家的時候，「忽然起來一個怕人的想頭，她想：『假若爺爺死了？』」可以說，小說從前三節靜寂美好的環境開始轉向到鋪設死亡的情節，第四節開始出現轉折，之後翠翠聽到吊腳樓下面水手和傩送的談話，「樓上婦人的爸爸是在棉花坡被人殺死的，一共殺了十七刀。翠翠心中有個古怪的想頭，『爺爺死了呢？』」<sup>48</sup>作者非常隱約地讓我們在小說的美好氛圍中感受到點滴的死亡之感。當然這些不是作者表達敘事的常態，小說依舊繼續描寫的「天空」「泥土」「杜鵑」「草木」「山川」，這些抒情化語言下的美好風景。直到小說的第十六節，爺爺從楊馬兵口中得知天保掉下漩水中淹死了。這是小說的轉折點，此後小說開始在人物死亡後不斷走向悲劇的下場，傩送的誤會，爺爺的傷心而去，翠翠痛失愛情和爺爺，這些在小說最後的五節繼續用客觀敘述迅速地豐富故事的情節。作者非常巧妙的將預言式的爺爺死亡和偶然性的天保意外溺水兩種死亡方式結合，共同推動情節的發展，通過天保的偶然性死亡達到小說人物命運和情節的突變，通過爺爺的預言式死亡讓讀者感受在美好的湘西世界之中還有一個寫實的世界，美好的環境、甜蜜的爱情、詩歌般的語言都是小說的背景鋪設，裡面實際是平實而殘酷的死亡下的人性影射，這也正是作者真正要表達的世界。

可以說，《邊城》是沈從文小說中牧歌化敘事語言的巔峰之作，作者極盡可能地將戰亂紛擾的湖南家鄉描繪成一個如詩如畫的地方，但躲不開情節的敘述

---

<sup>48</sup> 沈從文，〈邊城〉，卷六，頁90。

和現實的控訴，作者還是在小說最後運用死亡情節來將人物的個性命運一步步地展現給讀者。

## （二）日常抒情與死亡語言

作者不僅善於用抒情牧歌化的語調在小說中構建一個不同於現實的美麗世界，而且還擅於用日常生活瑣事來淡化死亡，所以讀者很少會發現作者對死亡血淋淋場景的刻畫和死亡之後儀式感的凸顯。作者將對死亡本身簡潔冷靜的描述襯托在日常瑣事的描述下，這就給讀者一種詭異的和諧感和荒誕感，而對死亡的簡單描繪就給讀者留下大量反思的空白。正如王德威認為，「在他筆下，緊迫和不緊迫的主題可以處在同一敘事層面而隱現自如，甚至造就一種參差的和諧。」<sup>49</sup>這就是將重要的、有價值的、推動情節發展的死亡進行輕描淡寫的敘事，而死亡之前和之後的背景敘述卻描寫得異常濃墨重彩，把不重要的日常瑣事部分進行細緻全方位的刻畫，顯得那麼重要和具有價值。這就將人們觀念中日常敘事的背景與死亡部分的輕重程度全部顛倒重置，這與歷來描寫死亡主題的作家魯迅、郁達夫等人都不相同。沈從文將背景敘述的著重描繪和死亡情節簡單敘述的設置，讓讀者在閱讀中常常陷入日常瑣事的敘述而忽略推動情節發展的死亡部分，增加閱讀後的茫然感，更凸顯了解讀主題和現實背景所具有的多重意義。

在短篇小說《石子船》之中，青春善良的八牛因為摸魚手被卡在石縫中而淹死。讀者是在船伙的轉述中知道，「淹到水裡，半天不見起來，伙計下水去看，一只手搯到石罅，他摸魚，石頭咬他的手，一切完了」；「八牛的屍身，已

---

<sup>49</sup> 王德威，〈“頭”的故事：歷史·身體·創傷敘事〉，頁 105-121。

為人從水中拖出，擱到來岸邊的樹下石板上了」；「屍用樹葉墊著」，<sup>50</sup>小說只用了寥寥幾句將死亡和屍體交代出來，而在之後船伙的反應，船主的反應，甚至死後也只是「破篷布裹身的死八牛抬到蒲葦村里去」，點燃廢竹當引路燈，船主擔憂怎麼和姑母交代以及他的十元銀錢的損失，以及他一直憂心忡忡的兩罈子錢等這些瑣事。小說又將生存中瑣碎艱難再次展現給讀者，正如小說開始部份講述康村就是採石發展成為市鎮，現實幾乎不會留給人們悲傷難過的時間，在這樣夾縫中的死亡就顯得那麼不重要。小說中唯一對八牛去世帶有儀式感的描寫是「買了兩斤錢紙放在岸上燒，火的紅光照到水面」，如此簡單的一句話，甚至接著就是寫環境的映襯。這就是沈從文對死亡描寫的特色。

不僅在小說《石子船》中如此，在短篇小說《七個野人與最後一個迎春節》也是如此。作者在小說的開始沒有很詳細具體地描述北溪村的社會情況和背景，是通過描述周圍進駐士兵的村莊進行強烈對比，來反映北溪村的不同，然後就重點描述了師徒七人在山洞中的生活。可以說山洞生活是北溪村生活的縮小版，日常「磨刀練武」「種菜澆水」「山頭唱歌」。作者還描繪了和女子過夜的生活瑣事，甚至師傅不僅教武藝漁獵知識，還會教征服婦人的法寶。作者對這些人物的日常行為的重點描繪非常到位，而只有小說的最後一段才簡單地寫了死亡的場景和結果，「有七十個持槍帶刀的軍人，有一個統兵官用指揮刀調度，把野人洞一圍。用十個軍人伏侍一個野人，於是將七個屍身留在洞中，七顆頭顱就被帶回北溪，掛在稅關門前大樹上。」<sup>51</sup>死亡部份描寫就短短幾行。在瑣碎的日常生活上作者可以說是耗費心思，甚至還細心地描繪了最後一個迎

---

<sup>50</sup> 沈從文，〈石子船〉，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三，頁13。

<sup>51</sup> 沈從文，〈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卷八，頁326。

春節的歡快場景，「佳餚」「燒酒」「唱歌」，就是在這樣牧歌化的語言下將死亡達到高潮以至戛然而止，「死亡」既沒有死前的鋪墊，又沒有死後的儀式渲染，只是交代了死亡的結果以及方式，沒有過多的話語描述圍觀人和心理。可以說，正是小說中的日常瑣事的鋪墊，才會讓讀者忽略了這種平和牧歌般生活背後隱藏的現實的忍痛，也就有了最後反轉的死亡結局給讀者帶來的震撼。

### （三）人物內心獨白與死亡語言

在沈從文的作品中，作者對人物內心獨白的描繪並不多，特別是在一些意外的淹死等死亡方式上，只有一些砍頭小說的題材上有簡單描述死亡人物的內心世界。施津菊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死亡敘事與審美》中講過，「屠戮生命的過程是其死亡敘事最為顯赫之處，也是當代文學的死亡敘事裡，最擅長把虐殺的方式與過程以及死亡感受及其細緻全面的展覽出來，又像近距離全方位慢鏡頭放映無聲電影似的呈現在受眾面前。」<sup>52</sup>這種對死亡的細緻描繪在沈從文的砍頭題材的敘事中完全沒有。他既不會細緻透徹地刻畫死亡之前人物的忐忑心裡、看客們的態度、死亡之後的狀況，更不會以一種血淋淋的方式敘述死亡的過程。這與當時擅長寫死亡的魯迅等一系列作家的敘事完全不同。但沈從文以他獨有的視角和態度來簡潔的描繪死亡前的內心的語言，讓讀者看到了他的精心構思，這就是死亡語言的瑣事內容和死亡前後的日常描繪形成來強烈的呼應。死亡不是重大的儀式，它似乎在日常中成為一個平常簡單的過程，生命也是可以隨時踐踏的所在。

---

<sup>52</sup> 施津菊，《中國當代文學的死亡敘事與審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61），頁236。



現實主義題材的小說《黃昏》刻畫的就是監獄的景況，自然也免不了人物的死亡。小說用了非常優美的語言描繪了一個貧窮、衰落、腐爛的石頭城，「有一些雲彩鑲了金邊、白邊、瑪瑙邊、淡紫邊……」「這炊煙次第而起，參差不起」<sup>53</sup>雖然極盡優美地刻畫一個破敗不堪的城市，但美好自然的風景與腐敗荒蕪的田地還是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而在這樣城市中有幸活下來的孩子長大以後不是乞丐就是罪人，大人們除了當兵、作匪徒、當小工來儘量生存下去，監獄正是座落在這樣的氛圍之中。裡面關的犯人：欠了小債的人、小偷、無可奈何犯法的平民、農民，而這些犯人只要罰款繳足就可以釋放。可以說這些大多數都是無辜可憐無奈的窮人。但作者似乎毫無憐憫之心，對即將要死亡的犯人沒有用更多的話語和筆墨去刻畫他的處境和可憐。小說中兩處描繪犯人在面臨死亡前的情況。第一處是，「犯人上身剝得精光，臉兒青青的，頭髮亂亂的，張者大口，半昏半死的」，「犯人或者望望這邊，也勉強喊一兩聲撐撐自己的場面，或沉默地想到家中小豬小羊，又怕又亂，迷迷糊糊走去」。第二處是，「請你告訴他們，我去了，只請她們幫我還村中漆匠五百錢……」<sup>54</sup>僅有的兩處死亡前的語言描寫非常具有特色。一個是從全知的視角去告訴讀者，犯人可能擔心的是家中豬羊，另外一個是從人物的內心獨白來明確知道他擔心的就是還錢的問題，兩處面臨死亡之前的描繪是從猜測內心獨白到肯定，但都沒有擺脫日常瑣事和生計的問題。小說中描寫的死亡語言，都讓讀者有一種深深的荒涼感和詭異感，好像在死亡面前，家中的豬羊、還錢是更大的事情，他們不關心生命何去何從。

---

<sup>53</sup> 沈從文，〈黃昏〉，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五，頁374。

<sup>54</sup> 沈從文，〈黃昏〉，卷五，頁378。

同樣在死亡發生以後，作者又回歸抒情化的描寫，如帶隊離開的副官，散去的人群，頭顱遊戲的孩子，奔跑回家的小孩，天上的紅雲，掛燈的公丁，惦記紅燒肉的典獄官。兩處死亡語言的內容都處處呼應著人為氛圍下日常瑣事的描寫。這幾乎完全將死亡本身都包裹在瑣碎的背後，死亡變得無關緊要，給讀者一種生命的卑微感和對生活的恐怖感。生存完全凌駕於生命之上，有了一種「人吃人」的恐怖感。

相比於死亡後日常瑣事的抒情描寫，作者把死亡描寫得平常化和流程化，這也是更讓讀者覺得恐怖和驚悚的地方。「劊子手從人叢中走出，走進犯人身邊去，很友誼似的拍拍那鄉下人的脖頸，故意裝成從容不迫的神氣，同那業已半死的人囑咐了幾句話，口中一面說：『不忙，不忙』，隨即嚟的一下，那個無辜的頭顱，就遠遠的飛去，發出沉悶而鈍重的聲音墜到地下了，頸部的就同小噴泉一樣射來出來，身子隨即也軟軟的倒下去，吶喊聲其於四隅，犯人同劊子手同樣被人當作英雄看待了。」<sup>55</sup>在這裡，我們看到死亡只是一個過程，好像和出門買菜的過程一樣。也許從劊子手的角度這是非常平常的過程，因為這只是他們的工作。但就連天真可愛的孩子在看到犯人行刑之前，還可以齊聲吶喊習慣的口號，「二十年一條好漢，值價一點！」這種死亡前的話語既沒有對他們命運不公的吶喊和反抗，也沒有對他們處境的悲傷，敘事既客觀又殘酷，甚至在行刑後，旁觀者們如對待英雄一樣的吶喊聲，孩子們開心地踢玩頭顱的遊戲。生命在這種行刑前的喧鬧和行刑後的玩鬧瑣事中結束了，幾乎看不到任何悲傷嘆息的話語。

---

<sup>55</sup> 沈從文，〈黃昏〉，卷五，頁 379。

### 三· 沈從文小說中人物死亡的方式與創作意識

帶有死亡氛圍的小說必然涉及兩個問題：殺人者和死者以及何種方式的死亡。這六部小說根據死亡的方式和意圖，可以將死亡分為自殺、砍頭、溺水、病死四種方式，其中自殺又可以細分為匕首自盡、吞金而死、服毒而死的方式。砍頭、自殺都帶有人為的因素，隱藏著社會價值觀、法律條例下的人性；相比之下，溺水、病死則帶有命運安排的宿命感，人生過程中無法避免的生老病死和意外的遭遇。所以筆者要從人為因素的死亡和自然因素的死亡兩個方面來解析死亡所反映的創作意識。

當提到沈從文的創作意識，就必須要提到沈從文的個人經歷。沈從文從 15 歲開始進入部隊生活，經歷了 5 年的軍閥生活的體驗，到他青年時期北京、上海、昆明、武漢、青島等地顛沛流離的教書寫作生涯，甚至在 1948 年到 1950 年的 2 年時間裡，不斷遭到左翼文化陣營的猛烈批判，從「我不毀也會瘋去」<sup>56</sup>的感慨，到「我十分累。聞狗吠聲不已，妳還叫什麼？吃了我會沉默吧。我無所謂施捨了一身，飼的是狗或虎，原本是一樣的」，<sup>57</sup>最後到「過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sup>58</sup>「人不能離群。一切由離群而起」。<sup>59</sup>這樣的精神歷程是沈從文以

---

<sup>56</sup> 沈從文：〈題〈綠魘〉文旁〉，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卷十四，頁 456。

<sup>57</sup> 沈從文：〈張兆和致沈從文·暨·沈從文批語·複張兆和〉，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卷十九，頁 11。

<sup>58</sup> 沈從文，〈日記四則〉，收入沈從文編，《沈從文全集》（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卷十九，頁 57。

<sup>59</sup> 沈從文，〈日記四則〉，卷十九，頁 59。

剃刀割破脖頸、割開兩腕、喝煤油自殺為代價的，從此他立誓擱筆不再創作。沈從文經歷過死亡，一生跌宕起伏，但仍堅持「文學家應有本分」的文學態度，而這樣的人生態度和學術態度在動盪不安的中國必然會讓他陷入糾紛和批判之中，也是不同黨派之間爭論的焦點。以至於自殺擱筆，從此堅持考古工作。相比於他的後半生近距離感受「死亡」，他的前半生可以說是無數遍的描寫和刻畫死亡，「生活太平凡單調了，要刺激，除了殺頭，沒有可以使這些很強壯的一群人興奮的事了。」沈從文在《我的教育》中講道，因此他在一遍遍描繪人性這座小廟的時候，死亡成為了最好的手段。

從沈從文的創作歷程可以看出，他主要受到三個方面的影響：青年時期的軍閥部隊生活的影響，文學革命的啟蒙思想和當時中外作家的影響，以及家鄉湖南巫楚文化的影響，但不管是哪個方面的影響，都讓他想要表達自己獨特的價值觀。正如他生前的題辭一樣：「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sup>60</sup>沈從文的作品也是終其一生都在表達他想要說的「人」。

### （一）人為因素的死亡

砍頭、自殺是沈從文作品中死亡的重要方式，而這不同的方式下反映的是作者對不同階層人生的描繪。沈從文的社會現實題材作品反映了很多對當時社會現狀的關注和思考。在 1929 年以後，由於當時政治局勢的激烈動盪，他的朋友丁玲、胡也頻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左翼文學思潮興盛，作品中出現了大批「標準化人物」，因此沈從文在文章中表示，「文學是可以寫政治的，但『要求作家有真思想』，對人生有深入獨到的認識和體驗，而不是滿足於從某種現成

---

<sup>60</sup> 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頁 93。

觀念出發進行創作，否則就難免公式化傾向的出現。」<sup>61</sup>而在文學作品中表達「死亡」的標準化意義就是「為了革命事業而犧牲的英雄主義死亡觀念」。<sup>62</sup>所以沈從文既反對作品的「政治化傾向」，又反對「英雄化形象」的人物，只有合乎人性的表達，甚至那些死亡，都是在告訴讀者，生命、人生、生活，以及我們應該如何面對。

首先是關於死亡與環境的描寫。在沈從文的社會現實題材小說中，非常尖銳地揭露權利下的社會現狀。但作者抒情化的敘事結構和語言從來都是將重要的情節甚至死亡隱藏在瑣碎不重要的敘述上，這讓小說的主題和表達上具有多重含意。甚至會有人當面問沈從文，想要表達的主題是什麼。當然沈從文常常就會用「我已經全部寫在故事裡了」的態度。所以將他的作品對比和串連地去閱讀，才能更好地釐清他小說中「簡單語句」背後隱藏的深刻內涵，整體地理解那個社會環境下人們的生存景況以及作者精心構思的主題。

單獨看《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只是寫師徒 7 人為了逃稅而躲進山洞裡後來被官兵砍頭的故事，但將這個故事和後面 1932 年創作的《黃昏》對照結合看，就會驚異地發現北溪村的後來情況也許就是石頭城的現狀。在《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中，罔顧法律和國家制度是不應該的，所以對於 7 個野人的最後遭遇也讓人覺得「正常」。但死亡不只是小說的結束，是另外一個社會的開始和新的黑暗。所以《黃昏》中，當官兵進駐城市以後，我們看到了荒蕪的農田，處處透露著「腐爛」「滅亡」、連年兵亂下頹廢的城市。在這樣的城市氛圍中，監獄都顯得不那麼恐怖了。在《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裡，作者弱化消解了革命帶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糾紛，所以裡面主要人物的個性

---

<sup>61</sup> 凌宇，《沈從文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頁 269。

<sup>62</sup> 施津菊，《中國當代文學的死亡敘事與審美》，頁 2。

化、差異化非常小。但在環境改變的描寫上卻非常深刻徹底。作者構建了一個被新的「大都會文明」侵入的北溪村，實質上對於當地民眾來說，就是官兵進駐收稅的變化，正如小說最後的結尾，「做皇帝的也不過是一頂帽子擱在頭上，帽子是用金打就的罷了。」而這個「帽子」就是「政權」罷了，掌權者只不過從清朝皇帝變成其他人，政權更迭而已，對人們的生活基本沒有任何改善和幫助。讀者可以深刻地看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社會：改革後的北溪村，「不必做工也可以吃飯的人了，又有靠說謊話騙人的大紳士了，又有靠狡詐殺人得名得利的偉人了，又有人口買賣行市了，與大規模官立鴉片煙館了」。<sup>63</sup>而那些底層的人，大抵就是《黃昏》中監獄的人，那些欠債的平民和窮人的下場，被草率糊塗的聞訊之後，沒有繳足罰款的人就是城外砍頭的結果。「稅收」「官兵」「法律」的社會，本來不是貶義的詞語，應該是一個進步的社會，但在黑暗的統治下卻是壓榨人們生存、剝奪人們生活的工具。

作者通過環境之間的對比延伸，揭示了環境的變化引起人性對生命態度的改變，反映的更是人性的變化。從官兵進駐前的北溪村到改革後的北溪村，甚至到腐爛的石頭城，人性也從打獵種菜、男女約會的簡單淳樸成為了奸詐殺人、得名得利的人了，以至於最後石頭城中，日常砍頭的戲碼，小朋友可以街頭吶喊頭顱踢玩的遊戲。在兩部小說的對比中，「死亡」是環境衝突的結果，但更是人性眼中的遊戲。在一個黑暗權利統治的社會環境下，「死亡」就只是統治的工具，生命的威脅、血淋淋的殺害都不如現實的生存來的更重要。

其次是關於死亡與愛情、權力的描述。沈從文多年的社會經驗讓他對權力和統治有一種深深的厭惡。「在沈從文眼裡，權力與無知是一胞雙胎的親兄

---

<sup>63</sup> 沈從文，〈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卷八，頁 325。

弟……這種伴隨著無知的權利濫用，只激起沈從文對權力的極端憎惡。」<sup>64</sup>所以在沈從文的作品中，《八駿圖》等一些現實題材的作品很明確的表現出他對權力和上層統治者的諷刺。同樣在他的愛情小說題材中，我們也同樣在他創造的神奇故事中「留白」的部份找到了痕跡。

沈從文愛情題材小說都充滿詭異的色彩。中國傳統的愛情故事，不管是漢代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還是明清的戲劇小說《牡丹亭》《聊齋誌異》，都是想要表達可以超過生死的愛情，不會因為外在因素人為的原因而背叛愛情的忠貞愛情態度，這種「情本思想」就是以男女情感為基礎的。<sup>65</sup>可以說，這一方面是沈從文繼承中國傳統的方面。但弔詭的地方是，這種愛情在傳統戲劇小說中男女自殺雙雙殉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數都是因為不被外在社會或其他人為原因所接受而不得不選擇自殺來表達對愛情的忠貞，而沈從文的筆下的男女主人公的殉情死亡與外在因素無關。小說《媚金·豹子·與那羊》，媚金的自殺只是因為豹子的遲到而誤認為自己被欺騙，造成最後的悲劇結尾。這種簡單和詭異的自殺理由總是讓讀者覺得匪夷所思，可以說這是處在內在人性的至高道德標準造成最後的悲劇。所以人們不禁懷疑小說的真實性。但其實，在具有濃厚的苗族傳統的湖南社會，這種情況是存在且正常的。正如凌宇認為，《媚金·豹子·與那羊》具體情節雖然是作者想像的，但依據還是少數民族存在的社會風俗而寫的，愛情、婚姻的自由選擇的風俗，「直到解放前夕，仍然較多的保留著母系社會的制度與習俗的較完整的型態」。<sup>66</sup>而這種原始的母系社會中，以歌傳情，自由戀愛的風俗與當時提到的社會都市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這種環境下

---

<sup>64</sup> 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頁 23。

<sup>65</sup> 李根亮，《死亡是一面鏡子—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中的死亡現象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64），頁 82。

<sup>66</sup> 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頁 202。

的人單純而真摯。因此在理解到故事的真實性以後，通過小說「美的歌聲與美的身體同樣被勝成為無用東西了。」「愛情的字眼，是已經早被無數骯髒的虛偽的情慾所玷污，再不能還到另一時代的純潔了。」<sup>67</sup>作者用謎一樣的戲劇色彩來表達一個這樣純潔的愛情故事，而與另外一個愛情題材的小說《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對比，就會深感作者的良苦用心。

小說《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用一個「下雨」的開頭將故事引向了軍隊。小說分為兩條線索，明線是講述「我」和號兵、豆腐舖老闆暗戀一個女人的故事，軍隊趕路——駐紮在城裡——號兵受傷——遇見女孩——認識商會對面的豆腐舖老闆——女孩吞金——豆腐舖老闆不見了，故事戛然而止。但暗線卻是講述軍隊士兵以及底層人士生活的故事，軍隊裡的日常用度——號兵受傷的經過——場坪殺人——年輕的軍官進到女孩家裡——我和號兵打架——女孩吞金——屍體和豆腐舖老闆不見了——號兵繼續當兵——我離開了。不管是明線的暗戀奸屍的傳奇還是暗線的砍頭殺人的現實，都逃不開作者設置的謎語，「為什麼吞金，同些什麼人有關係，我們當時一點也不明白，直到如今也仍然無法明白。（許多人是這樣死去，活著的人毫不覺得奇怪）。」<sup>68</sup>不得不說，在作者構造的世界裡，充滿了各種詭異、恐怖的氛圍，會長女兒的死亡是莫名其妙的，而最後復活的故事也是毫不根據，甚至都不如小說中場坪殺人現場，匪犯的死因在小說中都是「選擇幾個做壞事有憑據的」。一個上層階級女孩的死亡可能都不如一個罪犯的死因更明白，甚至都沒人為了她的死而伸張難過，大抵真正難過的只有豆腐舖老闆和號兵吧。而這樣充滿疑問的死因背後我們可以發現小說的伏筆，常常看見的年輕的軍官，「就以為這其中一定有一些故事發生，充滿了難

---

<sup>67</sup> 沈從文，〈媚金·豹子·與那羊〉，卷二，頁 396。

<sup>68</sup>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卷六，頁 41。



受的妒意。」甚至還引起了「我」和號兵的打架。結合故事發生的背景，是在一個「有藥鋪同煙館，有賭博地方同喝酒地方」的市鎮，這個市鎮是一個商業較發達的城市，而作為上層階級女孩的死亡卻並沒有人覺得奇怪，這匪夷所思的現象不得不讓人們懷疑背後的交易或陰謀。小說中更奇特的地方是，女子死了以後，作者有這樣一段評述，「似乎各人皆知道女人正像一個花瓶，不是自己分內的東西；這花盆一碎，先是免不了有小小惆悵，然而當大家討論到許多花盆被一些混帳東西長久佔據，凡是花盆終不免被有權勢的獨佔。」<sup>69</sup>作者通過將花盆比喻成女子，與權勢聯繫了起來。可以說沈從文非常巧妙地將主題隱藏在紛繁的陳述之中，甚至都沒有讓讀者發現，原來這樣模糊侷限的「有我」視角下其實是為了隱藏作者真正的用心，他無法用直白坦率的語句來為女子的可悲高呼，但他更希望在這樣詭異恐怖的氛圍中將女人在現實權勢面前的無能為力更好地表達出來，即便這個女子擁有不錯的地位，是處於上層社會中擁有一定權勢的階級，但她仍然擺脫不了「是個具有較高價值的工具」的身份。而這樣的現實卻是我們完全不了解的五四革命中高舉「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口號的社會，這也許就是沈從文作品中想要表達的「人性的不同形式」，不管時代的變遷，不管是經歷過什麼樣改革的社會，我們的命運都不能背離權勢而自由自在地生活。沈從文通過隱約的伏筆和直白明確的評論，讓我們明白女孩的死亡應該和年輕的軍官有關係，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小說開始部分會講到軍需的草鞋，穿皮靴的團長，騎馬的營長，穿草鞋的班長「我」和其他士兵，這樣一個等級分明、權利和統治階層清晰的軍營制度，甚至號兵是如何在又累又困的情況下服從命令吹號，以至於跳下石獅子的時候扭傷腳而殘疾，這些無一不體現了權利的關係，甚至還有上層階級「女孩死亡」背後所不為人知的陰謀和手段。而

---

<sup>69</sup>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卷六，頁42。

當我們反思小說《媚金·豹子·與那羊》的時候，才開始明白《媚金·豹子·與那羊》愛情純潔的偉大，那至高道德標準下自我內省精神的可貴。

其三是關於生命與生存的矛盾問題。凌宇提到沈從文思想中有兩個概念，「生活」和「生命」。他認為「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為了延續後代得婚姻行為」，「生命是有一種從自在狀態上升到自為狀態的自覺認識。」<sup>70</sup>人們應該是有一種不能被「生活」所困的「生命」，因此生命的本質也就是不受到物質、金錢、權勢的干擾，同時還不會有法規、制度、現實條件的制約。而「人生形式」就是人們本真的、不受外在影響的一種「生命狀態」。在筆者看來，對這兩個內容更準確的概念應該是「生存」和「死亡」。三十年代戰爭的中國，生存是相比生活更低的要求，它只要求「食」就好。而「死亡」才是對生命更準確的解釋，它只是人們希望可以活下去的反映。

初讀《石子船》這篇小說的時候，都會讓讀者有個疑問，為什麼作者會讓船裡最年輕快樂的男孩八牛最後是摸魚被石縫夾住手淹死的結果呢？在小說中出現的人物，中年船主無時不擔心放在姑母處的兩罈銀錢會被人弄走，喜保散伙們運石只是為了賭博，只有八牛是美好善良的象徵，他對一切都充滿好奇，但他有自己的原則，他不會自己參與賭博，最多就是借錢給別人賭博就好像自己也賭博了，處處細節無時不展現他的單純、善良、青春的樣子，甚至他的母親已經在為他說親，準備給他娶一個燒窯人的 18 歲女兒，可以說這一切都是那麼美好。但作者就是要打碎生命的美好給讀者以現實的殘酷，這個現實就是人們對金錢的重視和生命的漠視，將錢財的物質和美好的生命品格進行強烈對比。小說中處處充滿了「錢」的主題。首先在開始部份就描寫船主一直擔心的兩罈銀錢，這種擔心是黨派鬥爭下銀錢的安全問題。然後就寫到喜保賭博輸光

---

<sup>70</sup> 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頁 114。

以後向船主借錢的情節，之後就是八牛想要去岸上看熱鬧而和船主借錢，一番爭執以後，終於借到錢的八牛還是把錢借給一個四哥的人，之後四哥贏了以後把錢還給八牛，八牛又還給船主。船主去姑母家告訴姑母聚福關門，「這老年人眼睛就紅了，因為她有三十七塊錢存放在聚福處。」<sup>71</sup>檢查了錢的船主這時聽到船伙告訴他八牛淹死的消息。甚至八牛死後還描述了「在八牛方面船主又損失了將近十元。」以及結尾「把妳贏了的錢買點紙燒給八牛」。小說中出現的每個人物都是和「錢」有不同程度的關係，整個運石過程都在擔心錢的船主，從內心到行動因為錢而時時刻刻的糾結和擔心；沉浸在賭博中享樂的態度生活的喜保和眾人，因為好奇去看看賭博而借錢的八牛，失去金錢而哭泣的姑母，贏了錢為八牛燒紙的船伙，可以說小說裡的每個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及小說情節發展的整個過程都串連了錢。而最後八牛的死亡就完成了「錢」和「生命」的強烈對比和衝突。作者將「金錢」與「生命」放置在同一處境，進行了一段很直接明白地論述，「洋錢是死東西，他擔心這錢會終有一天要失去，還仍然睡在那裏不動，卻不料到太陽一落坡，就得把一個好好的活人送到蒲葦村去埋到土裡。請想想，這突變怎樣處置那死者的母親同外祖母呢？不過說到這件事，自然是哭一陣罷了。鄉下的婦人，眼淚容易流，也容易止，過一陣，自然就會慢慢的把這事情忘記。」<sup>72</sup>這樣一段清楚的金錢生命對比點出了動亂社會下詭異的現狀，人們對待「生命」的重視度遠遠不如「金錢」重要。生命是一件可以忘記的事情，而金錢卻是整部小說船主都不曾忘記的事情。甚至在最後，「康村住了兵，太平無事了」，終於不再擔心錢，終將也遺忘了生命。

眾所週知，《邊城》塑造了環境美好、改造後淳樸善良的民族精神。但是

---

<sup>71</sup> 沈從文，〈石子船〉，卷三，頁 12。

<sup>72</sup> 沈從文，〈石子船〉，卷三，頁 14。

所有的美好無法掩蓋現實生活中人們生存的不易。每天渡船生活的爺爺，需要接客來養活自己的妓女，羨慕碾坊的主人順順的眾人，這些為了生存的「職業」雖然在抒情化的敘述背景下顯得美好而和諧，但無法掩蓋客觀現實的殘酷。只是相比於大都市北京、上海中生活的人們，《邊城》更多地表達了與「冷酷」「動盪」相反的情感「溫情」，但溫情下還依然是對人性的考驗。這在小說中四個人物的死亡就可以反映出來。

首先，翠翠父母的死亡，這在小說中沒有詳細描述過程，只是從爺爺的心理話語中得知的。兩個人因唱歌相愛，但翠翠父親是一名軍人，這種社會制度的約束「結婚不成」，母親不捨得離開爺爺和翠翠父親私奔，父親又出於軍人名譽的考慮而服毒自盡，不久生下翠翠的母親也自盡。這兩個人的死亡奠定了小說的背景，因為這個背景所以爺爺會非常希望有個合適的人照顧翠翠，「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給一個人，他的事情才算完結！交給誰？必須什麼樣的人方不委屈她？」天保和爺爺聊過翠翠，爺爺的心理是，「這個人是不是適宜於照料翠翠？當真交把他，翠翠是不是願意？」<sup>73</sup>這種心理狀態的多次描繪，正是反映爺爺糾結和矛盾的心裡。這也是後面擁有碾坊的天保和翠翠喜歡的攤送同時出現的時候，爺爺一直都沒有確定婚事的原因。嫁給天保，翠翠就可以有碾坊，後半生衣食無憂；嫁給攤送，是翠翠愛情得償所願的結果。雖然，小說開始描述爺爺是一個淳樸誠實的人，但在後面，當別人稱讚翠翠能幹，「誰得她有福氣」時，爺爺說「有什麼福氣？又無碾坊作陪嫁，一個光人」。還有後面攤送的評價，「只有老傢伙為人彎彎曲曲，不利索，大老就是他弄死的」。<sup>74</sup>這些都可以說明爺爺雖然是好人，但因為擔憂孫女的未來，所以在婚事面前變得物質世

---

<sup>73</sup> 沈從文，〈邊城〉，卷六，頁 111。

<sup>74</sup> 沈從文，〈邊城〉，卷六，頁 142。

俗，這無形中給愛情帶來了誤會和障礙。然後，小說出現的轉折就是天保意外淹死。死亡又一次讓人性接受考驗，因為爺爺說的話而誤會一氣之下離家的天保溺水而亡，儼送因此責怪爺爺在婚事面前的猶猶豫豫而害死了天保，於是選擇離開。最後想要尋求順順的幫忙也因談話無疾而終的爺爺，終於在內疚和傷心中，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離開人世。三次的死亡，人性面臨三次的考驗，第一次爺爺的改變，變的物質世俗；第二次儼送的改變，不能理智地對待死亡和埋怨他人；第三次翠翠的改變，忍痛接替爺爺的工作繼續生活下去。在一個美好祥和的山城中，為了生存而不斷妥協的生命，「死亡」一步步地改造人性，改變人。但沈從文還是帶有美好的願望，所以最後碾坊終於成為儼送的了，順順也願意認翠翠為兒媳婦等待儼送回來，生存與生命不再是一個矛盾的處境，也許他們是可以同時擁有的美好希望。

## （二）自然因素的死亡

溺水、病死的死亡方式，可以說在沈從文小說中經常出現，這種不受掌握的死亡讓讀者感受到「偶然」和「意外」的可怕力量，生命像一隻看不見的手拉著的「提線木偶」，命運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而沈從文也通過這種充滿意外的死亡方式來展現生命的偶然性，同時還在人物的心裡暗示中體現了命運冥冥之中的宿命感。

首先，關於溺水這樣的死亡方式，這可能與沈從文一直擅長描寫水的環境有關，在各種依山傍水的城市中，溺水也是最普遍而容易發生的意外。在他的小說中，人物的溺水都是突如其來的，沒有任何徵兆而意料之外的，「意外」和「明天」哪個先來真的讓人難以預測。在小說《石子船》和《邊城》都有人物

溺水的死亡方式，而沈從文寫溺水的發生，不僅僅是讓讀者覺得生命的可惜和難以掌控，更讓讀者覺得事件發生背後的那種恐怖感，好像是存在著難以預測的陰謀一樣，這都是因為沈從文筆下發生溺水的人物其實都是平時擅長泅水，一個經常與水接觸的人卻被水淹死的匪夷所思之感。《石子船》中的八牛是很擅長泅水的，小說中有這樣描寫：「他將泅水過河，這河有四分之一里寬，水深有河身寬度五分之三，他慢慢的泅去，用腳排水，用手扒，昂著頭，他還能聽遠處唱歌的聲音。不久他又從彼岸泅回了」這段將八牛泅水的技術描繪的非常清楚，而這樣的能力和年紀，幾乎無法讓人以為會有意外發生。同樣，天保也是擅長泅水和下船的。小說就有「他的父親，掌水碼頭的龍頭大哥順順，年輕時節便是一個泅水的高手」；「兩個年輕人皆結實如小公牛，能駕船，能泅水，能走長路」；「天保和儼送兩人皆是當地泅水划船好選手」。天保經常會「跟船下桃源」「駕油船下駛」，甚至計畫「成呢，便是讓要我撐渡船，我也答應了他」。對於天保的死亡，爺爺是非常震驚的：「從不聽說有水鴨子被水淹壞的」。<sup>75</sup>沒有一點徵兆的死亡非常具有戲劇化。但仔細從八牛和天保的死亡給人帶來的「意料之外」的「偶然」，沒有一點徵兆，我們也能發現作者正是利用這樣的「偶然」作為最好的工具來讓情節達到反轉的效果，將小說的戲劇色彩達到最好的效果。八牛的突然死亡，最後才有對「金錢」反思，天保的突然去世，才有小說情節走向和人物結局的轉變。可以說，溺水這種非常具有偶然性的死亡方式，很好地為作者的抒情敘事增加跌宕起伏的效果。

其次是病死的死亡方式所反映的作者宿命感意識。在代表作《邊城》中，相比天保的完全意料之外的溺水死亡，爺爺的死亡是在人物不斷的心理暗示下最終的結果。小說中一共有七處很明顯地在暗示著爺爺的死亡，其中有兩次是

---

<sup>75</sup> 沈從文，〈邊城〉，卷六，頁 139。

翠翠的心裡，爺爺醉酒晚歸，「她想：“假若爺爺死了？”」聽到水手議論婦人的爸爸被人殺死，「爺爺死了呢？」這兩處是從旁觀的視角來預設爺爺死亡的結果，其餘 5 次就是爺爺自我的心理感覺，爺爺由翠翠媽媽的死亡想到翠翠已經長大了，所以「他以為死是應當快到了的」。爺爺和二老聊天，「不久就會躺在這冰涼土地上餵蛆吃的」。爺爺和翠翠談與大老的婚事，「人老了，再過三年兩載會過去的」。拉船回來晚來的爺爺，「翠翠，爺爺不在了，妳將怎麼樣？」「翠翠，我來慢了，你就哭，這還成麼？我死了呢？」爺爺和翠翠聊天，「他想到被死亡抓走那一類事情」。這五次的心理暗示，終於在最後的雷雨聲中爺爺說，「一切要來的都得來，不必怕。」作者非常具有深意地將爺爺預言式的死亡貫穿小說的始終，從第四節的翠翠心理到後面變成爺爺的心理，並在小說最後塵埃落定。

沈從文不僅運用預言式的死亡來表達他宿命感的生命意識，而且他還表達了宿命感不可擺脫和延續的特點。小說第一節就將翠翠媽媽的悲劇愛情命運作為背景鋪墊，並且兩次表達了意識中始終存在的不可擺脫的宿命感，「如今假若翠翠又同媽媽一樣……」，「隱隱約約便感覺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運」。除此之外，爺爺兩次提到「天意」，一次是翠翠母親的死亡，一次是天保的去世，發出這樣的感慨，「這是天意！一切都有天意」。「天意」其實就是人生命運的自然歸屬，也就是宿命感的內在必然性和循環的特點。這種觀念與中國傳統宗教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佛教的業障輪迴和生死輪迴都有這樣「循環」的特點。正如弗雷澤就認為「人類的思維是沿著巫術——宗教——科學的方式一步步發展的」，並且在《金枝》引用很多材料，說明古代的神話祭祀、四季變換的循環都有這樣的生命輪迴的宿命意識。<sup>76</sup>

---

<sup>76</sup> 張光芒、張立傑，〈論沈從文小說的宿命意識〉，頁 23-26。

沈從文在小說中設置的溺水、病死的自然死亡方式，很明顯地表達了他對人生的「偶然」和「意料之外」的感嘆，以及他對命運的不可捉摸之感和冥冥之中支配一切的宿命意識。



## 結論

以上通過對沈從文小說的文本研究、敘事方式研究、抒情語言研究以及人物的死亡方式研究，可以看出沈從文如何運用死亡來表達他的創作意識和主題，完成他終極一生都想要構造的「人性」這座小廟。所以他構造的具有現實社會縮影的「湘西世界」，可以說是真實的表現各種各樣的「人生形式」，不僅在題材千變萬化，有愛情，有親情，而且在不同題材上展現不同階級的人，士兵、農民、下層官僚、商人、獵人、渡船人、老師、妓女等各種身分的人，而且在他所追求的「美好」「自然」「真實」「不受外在約束」的生命狀態也從來不是完美無瑕的，有美好的希望也有無可挽回的死亡和離開，因此不會只有童話般的簡單美好的情節，不會都是烏托邦世界裡的圓滿幸福的結局，這也就是複雜的現實社會中人們面對命運的無可奈何。而在這些故事的背後，可以看到作者採用不同的視角來表現主題，「有我」的旁觀視角、「無我」的全知視角，還有視角轉換下的時空對應，這些視角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主旨。有努力克制隱藏他對權勢的抨擊，有努力讚揚善良淳樸的人們，有表達對人性陰暗的無可奈何。並且作者運用抒情的敘事語言來表達死亡所具有重要的意義，牧歌語言與「死亡」情節的對比中，突出死亡在小說中推動情節發展和增加戲劇色彩的作用，並且將死亡隱藏在日常瑣事的敘述背後，凸顯死亡語言的客觀簡潔敘述的特點，作者還通過不同人物的內心獨白將死亡的世俗化物質化和流程化特點表達出來。最後通過沈從文的六部小說，《媚金·豹子·與那羊》、《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黃昏》、《石子船》和《邊城》將人物

自殺、砍頭、溺水、病死四種死亡方式分為人為因素的死亡和自然因素的死亡，表達了人為因素背後的死亡與環境、死亡與愛情權利、以及死亡與生存的矛盾關係，環境對人性的一步步改造作用，權勢下人性向死而生的尋求解脫，處在夾縫中尋求生存的生命個體，還有在自然因素的死亡方式下表現作者的人生、生命的偶然和宿命等意識，正如沈從文在《邊城》中寫的，「凡事都有偶然的湊巧，結果卻又如宿命的必然」。

## 參考文獻

杜素娟，《孤獨的詩性—論沈從文與中國傳統文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黃琦旺，〈沈從文小說的鄉下人意識和原始情慾與近世白話小說的型態〉。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

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凌宇，《沈從文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

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長沙：岳麓書社，2006。

劉洪濤，《沈從文小說於現代主義》。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李根亮，《死亡是一面鏡子—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中的死亡現象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64。

龍慧萍，〈沈從文湘西世界中的神巫形象〉，《文藝爭鳴》，卷7，2007年，頁144-146。

羅錦鴻，〈論沈從文小說中“死亡書寫”的意義〉，《文學界：下旬》，期11，2010年，頁63-64。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施津菊，《中國當代文學的死亡敘事與審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61。

沈從文，《從文自傳》。香港：匯通書店，1976。

沈從文，〈答凌宇問〉，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卷十六。

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收入沈從文編，《沈從文選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卷九。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六。

沈從文，〈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八。

沈從文，〈媚金·豹子·與那羊〉，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二。

沈從文，〈《阿黑小史》序〉，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五。

沈從文，〈邊城〉，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六。

沈從文，〈石子船〉，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三。

沈從文，〈黃昏〉，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卷五。

沈從文：〈題〈綠魘〉文旁〉，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卷十四。

沈從文：〈張兆和致沈從文·暨·沈從文批語·複張兆和〉，收入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卷十九。

沈從文，〈日記四則〉，收入沈從文編，《沈從文全集》。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卷十九。

唐東堰〈生命的迷狂與神秘智慧—沈從文 40 年代創作與思想的另一面〉。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 年。

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矛盾，老舍，沈從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王德威，〈“頭”的故事：歷史·身體·創傷敘事〉，《東吳學術》，期 1，2012 年，頁 105-121。

吳世勇，〈論影響沈從文創作的六個因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 年。

吳正鋒，〈沈從文創作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0 年。

肖百容，《直面與超越—20 世紀中國文學死亡主題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6。

解志熙，〈愛慾書寫的‘詩與真’ 沈從文現代時期的文學行為敘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期 11，2012 年，頁 82-111。

袁進，《中國文學觀念之近代變革》。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

趙學勇，《沈從文與東西方文化》。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

趙園，〈沈從文構築的“湘西世界“〉，《文學評論》，卷 6，1986 年，頁 50-66。

張光芒、張立傑，〈論沈從文小說的宿命意識〉，《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期 4，2000 年，頁 23-26。

張華，〈論沈從文的死亡意識〉，《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20，2003 年，頁 85-89。

周仁政，《巫覡人文—沈從文與巫楚文化》。長沙：岳麓書社，2005。